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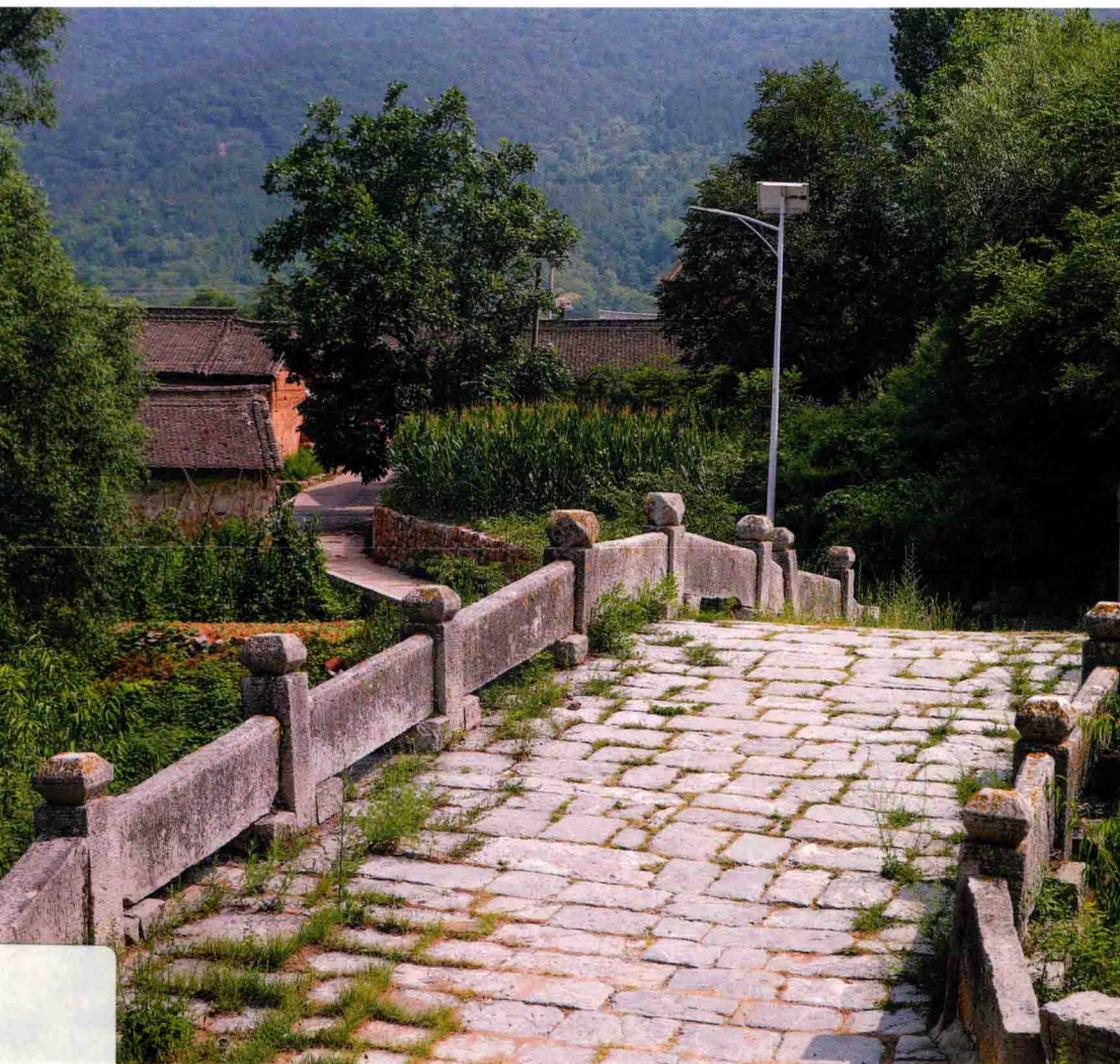
QINHEFENGYUN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GUDAOUYOUYOU
主编 | 行 龙

古道悠悠

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城交通与沿线聚落

李 嘎 | 著



QINHEFENGYUN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

GUDAOUYOU
主编 | 行 龙

古道悠悠

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城交通与沿线聚落

李 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道悠悠：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城交通与沿线聚落 /
李嘎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6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行龙主编)
ISBN 978-7-203-09611-5

I. ①古… II. ①李… III. ①古道-研究-晋城市-明清时代②古道-研究-晋城市-民国③聚落地理-研究-晋城市-明清时代④聚落地理-研究-晋城市-民国 IV. ①K928.6②K9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23514号

古道悠悠：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城交通与沿线聚落

丛书主编：行 龙
著 者：李 嘎
责任编辑：魏美荣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mail：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销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50千字
印 数：1-1600册
版 次：2016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6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9611-5
定 价：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

沁河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

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

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至今依然风韵犹存。

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地，

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

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

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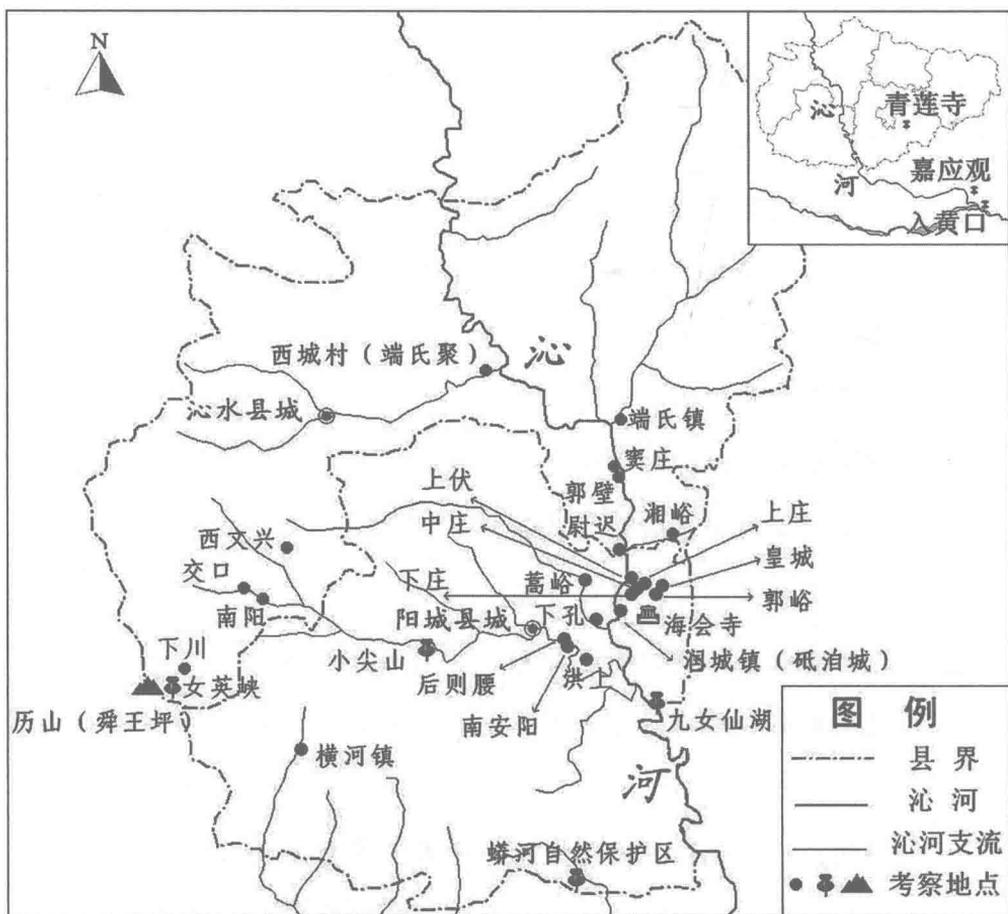
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

这里更有那独特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由此，我们组成“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由此，我们从校园和图书馆走向田野与社会，

走向风光无限、风韵犹存的沁河流域。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集体考察地点一览图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嘎绘制)

三晋文化传承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

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
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

第一场

鸣锣开张：

走向沁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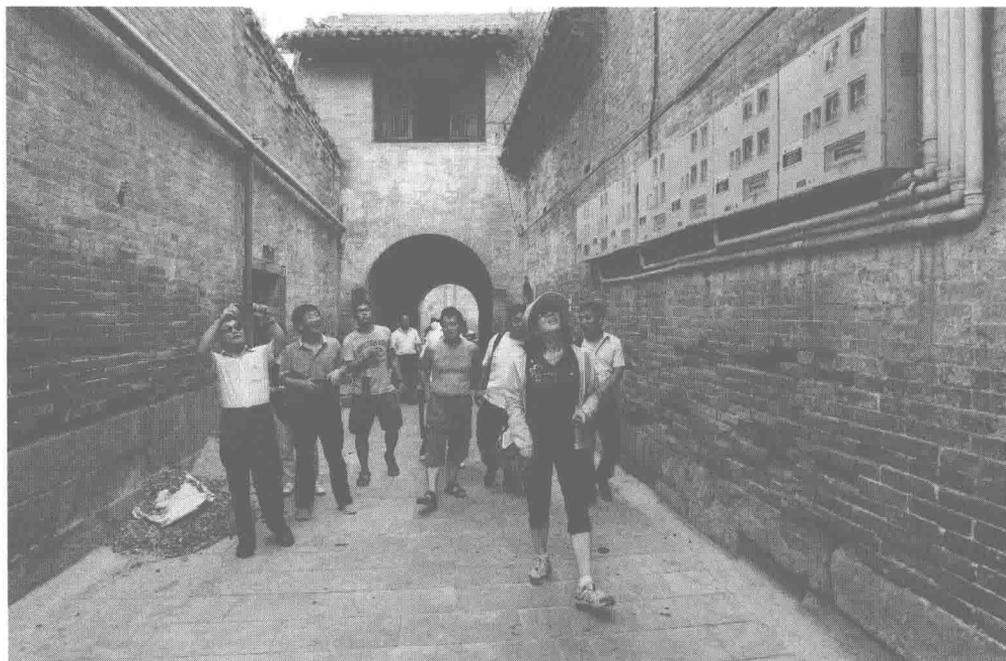
主讲人：行龙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教授

时间：2014年6月20日 7:30

地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晋阳楼）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海报



田野考察



会议讨论

总序

行 龙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就要付梓了。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同时作为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乐意受诸位作者之托写下一点感想，权且充序，既就教于作者诸位，也就教于读者大众。

“沁河风韵”是一套31本的系列丛书，又是一个学术团队的集体成果。31本著作，一律聚焦沁河流域，涉及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生态、旅游、城镇、教育、灾害、民俗、考古、方言、艺术、体育等多方面，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可以说，这是迄今有关沁河流域学术研究最具规模的成果展现，也是一次集中多学科专家学者比肩而事、“协同创新”的具体实践。

说到“协同创新”，是要费一点笔墨的。带有学究式的“协同创新”概念大意是这样：协同创新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集中精力干一件事情。教育部2011年《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提出，要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具体做法上又提出“四个面向”：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遗产、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2014年春天，山西大学成立了“八大协同创新中心”，其中一个是由我主持的“三晋文化遗产与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在2013年11月山西大学与晋城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在

征求校内外多位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集中校内外多学科同人对沁河流域进行集体考察研究的计划，“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由此诞生。

风韵是那前代流传至今的风尚和韵致。词有流风余韵，风韵犹存。

沁河是山西境内仅次于汾河的第二条大河，也是山西的一条母亲河。沁河流域有其特有的风尚和韵致：这里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孵化器；这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过渡带；这里有闻名于世的“北方城堡”；这里有相当丰厚的煤铁资源；这里有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这里更有那独特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风貌。

横穿山西中部盆地的汾河流域以晋商大院那样的符号已为世人所熟识，太行山间的沁河流域却似乎是“养在深闺人不识”。与时俱进，与日俱新，沁河流域在滚滚前行的社会大潮中也在波涛翻涌。由此，我们注目沁河流域，我们走向沁河流域。

以“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对沁河流域进行考察和研究，是由我自以为是、擅作主张提出来的。2014年6月20日，一个周五的晚上，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鸣锣开张：走向沁河流域”的报告。在事先张贴的海报上，我特意提醒在左上角印上两行小字“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平台，一个众教授聚首的场域”，其实就是工作坊的运行模式。

“工作坊”（workshop）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我们传统上的“手工业作坊”。一个多人参与的场域和过程，大家在这个场域和过程中互相对话沟通，共同思考，调查分析，也就是众人的集体研究。工作坊最可借鉴的是三个依次递进的操作模式：首先是共同分享基本资料。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和话语可供讨论，进而凝聚共识；其次是小组提案设计。就是分专题进行讨论，参与者和专业工作者互相交流意见；最后是全体表达意见。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即将发表的成果，将个体和小组的意见提交到更大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学术工作坊”的操作模式得到与会诸位学者的首肯，同时我简单

介绍了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为什么是沁河流域中游沁水—阳城段，沁水—阳城段有什么特征等问题，既是一个“抛砖引玉”，又是一个“鸣锣开张”。

在集体走进沁河流域之前，我们特别强调做足案头工作，就是希望大家首先从文献中了解和认识沁河流域，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初步确定选题，以便在下一步的田野工作中尽量做到有的放矢。为此，我们专门请校图书馆的同志将馆藏有关沁河流域的文献集中在一个小区域，意在大家“共同分享基本资料”，诸位开始埋头找文献、读资料，校图书馆和各院系及研究所的资料室里，出现了工作坊同人伏案苦读和沉思的身影。我们还特意邀请对沁河流域素有研究的资深专家、文学院沁水籍教授田同旭作了题为“沁水古村落漫谈”的学术报告；邀请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阳城籍教授张俊峰作了题为“阳城古村落历史文化刍议”的报告。经过这样一个40天左右“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过程，诸位都有了一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感觉。

2014年7月29日，正值学校放暑假的时机，也是酷暑已经来临的时节，山西大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一行30多人开赴晋城市，下午在参加晋城市主持的简短的学术考察活动启动仪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沁水县，开始了为期10余天的集体田野考察活动。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虽是酷暑难耐的伏天，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还是带着如火的热情走进了沁河流域。脑子里装满了沁河流域的有关信息，迈着大步行走在风光无限的沁河流域，图书馆文献中的文字被田野考察的实情实景顿时激活，大家普遍感到这次集体田野考察的重要和必要。从沁河流域的“北方城堡”窦庄、郭壁、湘峪、皇城、郭峪、砥洎城，到富有沁河流域区域特色的普通村庄下川、南阳、尉迟、三庄、下孔、洪上、后则腰；从沁水县城、阳城县城、古侯国国都端氏城，到山水秀丽的历山风景区、人才辈出的海会寺、香火缭绕的小尖山、气势壮阔的沁河入黄处；从舜帝庙、成汤庙、关帝庙、真武庙、

河神庙，到土窑洞、石屋、四合院、十三院；从植桑、养蚕、缫丝、抄纸、制铁，到习俗、传说、方言、生态、旅游、壁画、建筑、武备；沁河流域的城镇乡村，桩桩件件，几乎都成为工作坊的同人们入眼入心、切磋讨论的对象。大家忘记了炎热，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口渴，忘记了腿酸，看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历史与现实，想到的只是沁河流域的文献与田野。我真的被大家的工作热情所感染，60多岁的张明远、上官铁梁教授一点不让年轻人，他们一天也没有掉队；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的王扎根老先生，不顾年老腿疾，一路为大家讲解，一次也没有落下；女同志们各个被伏天的热火烤脱了一层皮；年轻一点的小伙子们则争着帮同伴拎东西；摄影师麻林森和戴师傅在每次考察结束时总会“姗姗来迟”，因为他们不仅有拍不完的实景，还要拖着重重的器材！多少同人吃上“藿香正气胶囊”也难逃中暑，我也不幸“中招”，最严重的是8月5日晚宿横河镇，次日起床后竟然嗓子痛得说不出话来。

何止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停地奔走，不停地转换驻地，夜间大家仍然在进行着小组讨论和交流，似乎是生怕白天的考察收获被炙热的夏夜掠走。8月6日、7日两个晚上，从7点30分到10点多，我们又集中进行了两次带有田野考察总结性质的学术讨论会。

8月8日，满载着田野考察的收获和喜悦，“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的同人们一起回到山西大学。

10余天的田野考察既是一次集中的亲身体验，又是小组交流和“小组提案设计”的过程。为了及时推进工作进度，在山西大学新学期到来之际，8月24日，我们召开了“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选题讨论会，各位同人从不同角度对各选题进行了讨论交流，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细化了具体的研究计划。我在讨论会上还就丛书的成书体例和整体风格谈了自己的想法，诸位心领神会，更加心中有数。

与此同时，相关的学术报告和分散的田野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着。为了弥补集体考察时因天气原因未能到达沁河源头的缺憾，长期关注沁河上游

生态环境的上官铁梁教授及其小组专门为大家作了一场题为“沁河源头话沧桑”的学术报告。自8月27日到9月18日，我们又特意邀请三位曾被聘任为山西大学特聘教授的地方专家就沁河流域的历史文化作报告：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家胜讲“沁河流域阳城段的文化密码”；沁水县沁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扎根讲“沁河文化研究会对沁水古村落的调查研究”；晋城市文联副主席谢红俭讲“沁河古堡和沁河文化探讨”。三位地方专家对沁河流域历史文化作了如数家珍般的讲解，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情系于斯的沁河流域的心灵体认，进一步拓宽了各选题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

这个阶段的田野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着，只不过由集体的考察转换为小组的或个人的考察。上官铁梁先生带领其团队先后七次对沁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系统考察；美术学院张明远教授带领其小组两赴沁河流域，对十座以上的庙宇壁画进行了细致考察；体育学院王金龙教授两次带领其小组到晋城市体育局、武术协会、老年体协、门球协会等单位和古城堡实地走访；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董江爱教授带领其小组到郭峪和皇城进行深度访谈；文学院卫才华教授三次带领多位学生赶去参加“太行书会”曲艺邀请赛，观看演出，实地采访鼓书艺人；历史文化学院周亚博士两次到晋城市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搜集有关蚕桑业的资料；考古专业的年轻博士刘辉带领学生走进后则腰、东关村、韩洪村等瓷窑遗址；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类学博士郭永平三次实地考察沁河流域民间信仰；文学院民俗学博士郭俊红三次实地考察成汤信仰；文学院方言研究教授史秀菊第一次带领学生前往沁河流域，即进行了20天的方言调查，第二次干脆将端氏镇76岁的王小能请到山西大学，进行了连续10天的语音词汇核实和民间文化语料的采集；直到2015年的11月份，摄影师麻林森还在沁河流域进行着实地实景的拍摄，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从沁河流域到山西大学，从田野考察到文献理解，工作坊的同人们各自辛勤劳作，乐在其中。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015年5月初，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开始参与“沁河风韵系列丛

书”的有关讨论会，工作坊陆续邀请有关作者报告自己的写作进度，一面进行着有关书稿的学术讨论，一面逐渐完善丛书的结构和体例，完成了工作坊第三阶段“全体表达意见”的规定程序。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个集多学科专家学者于一体的学术研发团队，也是一个多学科交流融合的学术平台。按照山西大学现有的学院与研究所（中心）计，成员遍布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育学院、体育学院、美术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城乡发展研究院、体育研究所、方言研究所等十几个单位。按照学科来计，包括文学、史学、政治、管理、教育、体育、美术、生态、旅游、民俗、方言、摄影、考古等十多个学科。有同人如此议论说，这可能是山西大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真正的一次学科交流与融合，应当在山西大学的校史上写上一笔。以我对山大校史的有限研究而言，这话并未言过其实。值得提到的是，工作坊同人之间的互相交流，不仅使大家取长补短，而且使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得以提升，他们就“沁河风韵”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甚至以此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

“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是一次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学术实践，是图书馆和校园里的知识分子走向田野与社会的一次身心体验，也可以说是我们服务社会，服务民众，脚踏实地，乐此不疲的亲尝亲试。粗略统计，自2014年7月29日“集体考察”以来，工作坊集体或分课题组对沁河流域170多个田野点进行了考察，累计有2000余人次参加了田野考察。

沁河流域那特有的风尚和韵致，那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吸引着我们。奔腾向前的社会洪流，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在召唤着我们。中华民族绵长的文化根基并不在我们蜗居的城市，而在那广阔无垠的城镇乡村。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文化先觉的认识者和实践者，知识的种子和花朵只有回落大地才有可能生根发芽，绚丽多彩。这就是“沁河风韵学术工作坊”同人们的一个共识，也是我们经此实践发出的心灵呼声。

“沁河风韵系列丛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虽然各书具体署名，“文责自负”，也难说都能达到最初设计的“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写作要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位作者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每一本书的成稿都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帮助：晋城市人民政府、沁水县人民政府、阳城县人民政府给予本次合作高度重视；我们特意聘请的六位地方专家田澍中、谢红俭、王扎根、王家胜、姚剑、乔欣，特别是王扎根和王家胜同志在田野考察和资料搜集方面提供了不厌其烦的帮助；田澍中、谢红俭、王家胜三位专家的三本著述，为本丛书增色不少；难以数计的提供口述、接受采访、填写问卷，甚至嘘寒问暖的沁河流域的单位和普通民众付出的辛劳；田同旭教授的学术指导；张俊峰、吴斗庆同志组织协调的辛勤工作；成书过程中参考引用的各位著述作者的基本工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对本丛书出版工作的大力支持，都是我们深以为谢的。

绪 言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就交通在地方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问题作过阐释，他说：“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合，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严先生所言可谓全面且深刻。其他姑且不论，仅就地域文化而言，我国之所以拥有众多差异性明显的地域文化，交通之畅阻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因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两地之间若有一座大山横亘，山体两侧的人们在方言、风俗、民间信仰等多个方面可能都会有显著的不同。原因何在？正在于庞大山体隔限你我、交通不畅所致。民国前期，山西沁水县的知事麻席珍将道路系统比之于人体之血脉，认为其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张路政乃是地方要务，为官者务必要高度重视。他说：“道路犹血脉也，血脉不周，则人身有痿痹之患；道路不通，则地方有闭塞之忧。反之，交通便利，地方未有不发达者。”（《沁水县修辟县城至浮山交界大车路碑记》，载《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总之，交通可谓是地方一切人文活动展开的前提。相应的，在学术层面上对某一特定区域的交通问题展开论述，是加深对该区域认识的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众所周知，方圆15.67万平方公里的山西自古以“表里山河”著称，地理大势将三晋大地塑造成一方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进一步而言，山西地区实又由几个“中观区域”拼合而成，譬如河东地区、上党地区、吕梁地区、晋中地区、雁北地区等，这几个亚区有着互不相同的自然地理面貌和人文风貌，差异明显。如若我们翻阅较大比例尺的地形图时，就会发现，每个“中观区域”内部的地貌类型实际上也是十分复

杂的，往往是山岭、河谷、盆地充斥其间，这样的自然地理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历史时期亚区内部的交通地理格局，使得交通真正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书所讨论的今晋城市域就是这样一方地貌复杂、交通“问题”凸显的“中观区域”。本区地势高峻，太行山、王屋山、中条山在此相汇，群山连绵。诸山之间沟壑纵横，多有河流发育，最著者乃沁河与丹河。沁河发源于沁源北部，经沁源、安泽、沁水、阳城等县，纵穿太行山入河南省，最后注入黄河，在山西省内流长360公里；丹河源出高平市北部的丹朱岭，经高平、泽州等县市，在河南省汇入沁河，在山西省内流长120余公里。诸山与众川之间穿插有面积不等的盆地，成为大型聚落衍生的地理依托。如此复杂的地貌布局，使得历史时期晋城区域的交通状况总体上不令人乐观，清初的大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形容该地“山谷高深，道路窄险”，这是一个很恰当、切实的评价。

本书讨论的时段是明、清、民国时期，具体采取“以县为纲、以大路为目、全面叙述”的创作理念。其一，何为“以县为纲”？顾名思义，就是以县为单位，每县一章，分别进行考察，采取这样的方式，可以保证论述的深度。其二，何为“以大路为目”？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发展到后期，一地之交通实际上已呈现为纵横交织、错综复杂的格局，其内既有等级较高的官道要路，也有沟通村落与村落的乡间小道，我们实不可能，也无必要对这些道路全部加以考察，对此，本书将选择其中最为重要的交通线进行专门叙述。具体来讲，就是以1999年版《晋城市交通志》所涉及的古代交通大道为主要论述对象。若以从治城至县界之路段为一条交通线计（若道路不经治城，则以自此县界至彼县界之路段计一条），该志书共涉及37条官道要路（参见该书第5—12页）。笔者认为，《晋城市交通志》是关于整个晋城市域古今交通状况的总记录，它所涉及的37条古道必是在区域历史上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交通线，以这些古道为主要论述对象有相当的科学性及其合理性。需要指出的是，

从晋城市域历史时期的交通地理逻辑出发，本书还另外讨论了3条交通线，即“泽州城经东沟镇入沁水县路”、“清化大道阳城段”、“沁水城经杏峪村入翼城县路”（详见正文叙述），笔者认为它们在沟通彼此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此一来，共论述古道40条，这是本书的“目”。其三，何为“全面叙述”？即笔者将对选定的40条交通要道开展全方位的讲解，以保证论述的广度。具体而言，首先，将复原40条交通线的具体经由地点。虽然《晋城市交通志》收录了道路的名目，但它所交代的经由地点是否能站得住脚呢？对此必须通过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等方式予以印证，属实则接受之，不属实则修正之。其次，将对每条道路的路况、修路行动等加以交代。虽然明清民国时期晋城市域的路况总体不令人乐观，是否这40条交通线全都如此？还是恶劣路况仅表现在某些段落上？针对路况问题，明清民国时期地方社会有没有发起过值得一提的修路行动？这些问题，本书将根据史料之有无、多寡，努力作出解答。再次，将对道路沿线的重要节点进行叙述，主要是对道路所经的关隘、山岭、渡口、桥梁等加以重点讲解。最后，在讲述完道路本体之后，本书将对沿线的重要聚落（包括市镇和乡村）开展论述。毋庸讳言，沿线聚落的发展变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驱动，交通仅为其中之一，本书将在每条道路沿线上慎重选择一些有价值的聚落作较全面的讲述。笔者认为，对沿线聚落进行讲解有助于加深对道路本身的认识。除以上四个方面之外，道路历史、交通秩序等问题，本书也将根据史料丰歉尽力予以交代。

本书的撰写主要依靠哪些历史文献呢？地方志、碑刻、民国调查资料、民国年间大比例尺地形图、地名志是本书利用最多的文献类别。首先，旧志资料作为研究地方史的传统文献，其价值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本书也不例外。今天见存的明清民国时期晋城市域的旧志资料有20余种，另有《山西通志》8种，这些地方志中存有大量的交通史料，诸如方志地图中对交通线的描绘，“八景”图对某些交通节点的反映，“建置志”中关于驿铺、聚落的记录，“艺文志”中有关交通的诗文